

唐朝文教政策对吐蕃教育的影响

周莹 张佳茹

(①西藏大学文学院 ②西藏大学师范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唐朝的文教政策包括在确立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吸取众家之长发展教育,允许私学存在,形成官学、私学共同繁荣的教育形式;在隋朝创立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教育直接为统治者服务;“推恩示信”、“爱之如一”的民族文教政策总方针以及建立有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求学制度等。这些文教政策对吐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如下影响: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吐蕃子弟求学于唐朝,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寺院教育成为吐蕃教育的主要形式;儒学教育在吐蕃得到发展。

关键词 唐朝 吐蕃 文教政策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1)04-073-05

一、唐朝的文教政策

唐代是我国古代最具活力的一个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综合国力非常强盛的国家之一。在军事国防、科学技术等领域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唐代的统治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教育领域。从李世民建立唐朝开始,唐代的统治者就非常重视文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李世民曾说过“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1]这里的中智之人指的就是需要进行教育才能变得高尚的人。

在民族文教政策方面,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当时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高峰时期。唐朝是民族融合的产物^[2],李家本身就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唐也十分注重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唐代统治者经常赏赐少数民族首领,遇到灾害之年又对少数民族群众给予赈济,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得到发展,而唐朝的威望和教化又得以传播到各少数民

族地区。总的来说,唐代的文教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确立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吸取众家之长发展教育

西汉时,汉武帝就治国方略广泛征集意见,董仲舒以其优秀的政治才能和学术造诣提出的三条建议受到汉武帝的欣赏。这三条建议被称为“天人三策”,分别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兴太学以养士”和“重视选举,任贤使能”。这三条治国方略实际上是三条文教政策,均被汉武帝所采纳,并经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帝逐步加以推广和实施,终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任用士阶层知识分子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制度。“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在古代的中国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它使重教兴学成为了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它促成了教育

的政治化、伦理化,它实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儒学化。

唐朝时期,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后,重新回到了大一统的局面。随着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以及中外交流愈加频繁,唐朝的国力日益强盛起来。此时,统治者的文教政策与两汉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不断进行本土化的运动,逐渐转化为中国佛教。而另一方面,生长于中国本土的道家,也在民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样,到唐朝的时候,传统的儒家、土生土长的道家和外来的佛教之间呈现出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借鉴的局面。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的需要和各自的倾向,不断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调节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来扩大自身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所以,唐代文教政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崇尚儒学的前提下,儒、佛、道三家并用。佛教和道家都有其自身合理的因素而存在于中华大地之上。儒、佛、道各自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都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都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代统治者在文化教育上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和气魄才使得唐代有如此光辉灿烂的文化传世,唐代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

(二)允许私学存在,形成官学、私学共同繁荣的教育形式

中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经相当完备了。唐代的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二者存在着递升的关系。中央官学设有“六学”、“二馆”。“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前三学属于普通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后三学属于专科学校,学习书法、历算和法律知识。“二馆”指崇文馆和弘文馆,为收藏书籍、整理校对书籍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场所。地方官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学生大多是庶民子弟,教学质量和教学要求也相对较低。

自孔子首开私学之后,私学在民间一直和官学并存地发展着。到唐代,社会上每一门学术都有私学传授。唐代统治者鼓励扶持官学的发展,但也允许私学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统治者对私学的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使私学的发展有了较为宽松的空间。安史之乱后,私学的规模超过了官学,

成为了中国古代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三)在隋朝创立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教育直接为统治者服务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隋初,进士科考开始,科举制正式产生。唐代继承了科举制并加以发扬光大,武则天十分重视科举选拔人才,开创了殿试、武举和糊名考试法;唐玄宗调整学校教育和科举制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发展。统治者用礼部主管科举考试,加强中央领导。到天宝年间,科举制中大部分的考试科目已经确定,科举制已经发展成为完备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产生于隋唐,持续至其后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仅见的。它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既不同于两汉时以德取人的察举制,也不同于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它是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也是中央集权需要的结果。它使选拔官吏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不论出身高低都可以通过科举实现自身抱负。

(四)“推恩示信”、“爱之如一”的民族文教政策总方针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胸怀宽广、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一生重视人才教育,登基后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使长期饱受战乱的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广大知识分子也可以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同时也是唐朝民族政策的奠基者。^[3]他曾经针对各少数民族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基于这种思想,唐太宗提出了“推恩示信”、“爱之如一”,这种思想也成为了唐朝民族文教政策的总方针。在他如此宽容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各少数民族对唐朝俯首称臣,唐太宗也被称为“天可汗”。

(五)建立有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求学制度

唐代实行接受少数民族子弟求学的制度,国子学对少数民族子弟开放。贞观十四年,国子学“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5]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子学的规模之大和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之多。也正是因为唐代开门

的文教政策,才使得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如此之频繁。

唐朝的文教政策非常丰富,这里只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论述。在唐朝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中,与吐蕃的交流是很有代表性的。青藏高原上自古就生活着藏族的先民,在公元7世纪西藏地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政权。吐蕃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是一位深具智慧、远见和胸襟的杰出的政治家。王辅仁、索文清的《藏族史要》中对于松赞干布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松赞干布这个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个眼界开阔,有政治远见的人物,对于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先进的中原文化,采取的是热情欢迎,努力仿效的态度。松赞干布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不是用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是用他掌握着的权力,大胆地引入外族,首先是汉族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来发展吐蕃社会的生产力。”^[6]唐蕃双方统治者开明的政治态度成为汉藏交流的有力推动力量。

二、唐朝文教政策对吐蕃教育的影响

(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

唐代中原文化对吐蕃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首推唐蕃和亲。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政治上,它把汉族文化带入青藏高原,使两种同样古老、悠久并且相邻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它使吐蕃的社会生产及文化教育都深受唐朝的影响。文成公主随行的嫁妆中有佛经、各类典籍,还带有工匠,为吐蕃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至今在西藏山南地区还流传着很多文成公主教他们一些刺绣技术的传说。赤德祖赞是继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杰出的统治者,他再度与强大的唐朝联姻,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迎娶金城公主入藏。金城公主的入藏,使得当时被苯教打击的佛教势力再度兴盛。当然,这与其中统治者的意愿是不无关系的。金城公主入藏后,重新把释迦牟尼的佛像供至大昭寺,她还组织人员翻译大量的佛教典籍和汉文化典籍。《诗经》、《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化典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翻译成藏文的。同时两位公主还给吐蕃带来

了医药、历法等典籍,使得吐蕃的医学、天文历法等科学都深受汉民族这方面的影响。而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流在这里仅仅是个开始。在唐高宗即位的初年,应松赞干布的要求,精通酿酒、水磨、纸墨的工匠又被派往吐蕃,给吐蕃的科技文化的发展贡献出了不小的力量。

(二)吐蕃子弟求学于唐朝,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化在吐蕃的传播

吐蕃最早对外派出学生求学是从松赞干布开始的。^[7]他先后派出去部分学生到印度,也派了部分学生求学于唐朝。去印度的留学生回来创制了藏文,沟通了印度和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传播了佛教文化。而到唐朝求学的吐蕃子弟,则是将大量的天文历算、医药知识等中原科技文化的精髓传播到了吐蕃。据史书记载,《易经》就是在这时期被译为藏文,传到吐蕃的。^[8]当时吐蕃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般是在唐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学读书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此外,还包括算学、法学和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吐蕃的统治者有向唐朝学习先进文化的意愿;一方面,唐朝的统治者又采取了非常开明的蕃汉一家的文化教育政策,使得吐蕃子弟求学长安成为了可能。而这些求学唐朝的吐蕃子弟在学成归来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吐蕃社会的栋梁之才,对吐蕃的军事、外交、政治活动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

(三)寺院教育成为吐蕃教育的主要形式

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大量流入西藏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桑耶寺建成后,佛教逐步兴盛,而苯教渐趋衰落。佛教在西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不仅垄断了西藏的政治,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从某种角度来看,藏传佛教也垄断了西藏的文化教育。从吐蕃时期开始,西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寺院教育的高度发达。古代西藏的寺院教育力量与规模远远超过所谓的正规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两位公主的入藏都带来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她们带来的佛像、佛经等佛教文化同印度、尼泊尔传过来的佛教文化共同作用,使吐蕃人民开始接受佛教文化、信奉佛教,同时也是西藏的寺院教育得到了突破性

的发展。

从“七觉士”在桑耶寺剃度受戒出家,吐蕃的寺院就开始了培养佛教人才的活动。而吐蕃的寺院教育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从此高原上“学在寺院”的现象出现了。吐蕃主要的科技、文化都是在寺院中发展的,寺院的僧人通过寺院教育也成为吐蕃最有知识的人才。在吐蕃的寺院教育中很有特色的一方面是僧人对佛教典籍的学习与对佛教典籍的翻译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使得佛教在吐蕃得以迅速普及。

(四)儒学教育在吐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吐蕃子弟在唐朝求学期间主要学习的是儒家经典,他们回吐蕃后,成为吐蕃的上流社会懂得汉族儒学的人才,这些人学有所成、精通汉语、熟读儒家经典,对历史、文化、礼仪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了解。这些人才通过到唐朝国子学的学习掌握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再把这些政治理论用于吐蕃的发展中去。而这些人才返回吐蕃后,又担任了吐蕃的重臣,成为吐蕃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吐蕃和唐朝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仲琮、钦陵、名悉腊等。

唐朝时期,各民族经过了空前的大融合,而又有空前的大交往。这一时期的唐蕃交往是中国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对唐朝文教政策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透彻的观察这一历史现象。这种和平开放的胸襟、丰富多彩的沟通交往内容也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交往有着极其宝贵的借鉴意义。

三、唐朝文教政策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

唐代的文教政策使当时的中国四海一统,各民族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对和谐,各民族的人民能够和睦相处。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交流,各少数民族培养了各自民族的栋梁人才,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对于今天我们对待民族文教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少数民族应积极同汉族进行文化教育领域内的交流

唐代时,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领域能够得到较

快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中原汉族地区进行积极地交流。当时,唐朝的文教政策在对待少数民族时尤其宽松,准许少数民族子弟进入国子学学习儒家经典;准许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对于榜上有名的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还予以录用做官,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中,从不吝啬于把先进的技术及经典的文化著作带往边疆,这一点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中就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在当代,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与内地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广泛引进和采纳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术,不断输入和输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教、文教领域的发展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目前,西藏自治区每年都有一大批的学生前往内地班学习,而这些学生在学成之后又返回西藏,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在内地的学习,他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专业技能,在实际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内地西藏班已成为给西藏建设事业输送人才的重要渠道,也对西藏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促进交流的前提

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各民族兄弟姐妹真诚地和睦相处,彼此才有发展的空间。唐朝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会确立如此开放、宽松的民族文教政策。唐太宗的“爱之如一”就是对各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地位的确认。在这一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没有区别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而各自又都有权利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才有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反过来,沟通和交流又促进彼此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正确处理教育与宗教的关系

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还有像藏族这样宗教占社会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民族。如何正确处理宗教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尊重各族的宗教信仰,但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只有这样,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持续发展。

注释

- [1][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8.
[2]欧阳蔓蓓.试述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在唐朝教育中的体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2):14.
[3]吴明海.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2.
[4]《资治通鉴》卷 198.
[5]《资治通鉴》卷 195.
[6]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19.
[7]何波.吐蕃子弟留学唐国子监述论[J].青海社会科学,1999(5):82.
[8]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2.

参考文献

- [1][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欧阳蔓蓓.试述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在唐朝教育中的体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2):14- 16.
[3]吴明海.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5]何波.吐蕃子弟留学唐国子监述论[J].青海社会科学.1999(5):82- 87.
[6]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7]王楠.唐太宗教育思想研究[D].信阳:信阳师范学院,2010.

The Effect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Tibetan Education of the Tubo Dynasty

Zhou Ying^① Zhang Jiaru^②

(^①School of Humanities,Tibet University; ^②Teachers College of Tibet University,Lasa,Tibet,850000)

Abstract: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o develop education led by Confucianism and the strong points of other schools. Private schools were allowed to coexisted with official school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riginated in the Sui Dynasty got improved so as to have education to service rulers better. In addition, a favorable education system was built to develop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s. Thes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had the following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education: Princess Wencheng and Princess Jincheng introduced advanced Chinese culture into Tibet; Tibetan children pursued their studies in China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ibet; Monastic education became the main form of Tibetan education; Confucianism education developed in Tibet.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the Tubo Dynasty;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mpact

[责任编辑 蔡秀清]